



玄览堂笔记

作家亲属对文学研究的干扰

顾农

有一位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老朋友在闲谈中对我说起过,现当代作家的哲嗣文孙中有若干位相当活跃,能量可观,他们在举办展览、开研讨会等等场合,往往定调子、划禁区,要求别人同他们保持一致,其干预的力度很强,让人感到比较难办。

应当承认,作家的后代有这样的权利,他们的作为也完全可以理解。剩下下来的事情无非是研究者的抗干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研究者得有自己的分析,不宜完全采纳家属对其先辈的评价,不能照单全收,对他们提供的材料也要注意鉴别。朱正先生的《鲁迅回忆录正误》(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新版增订本)即为这一方面的典范。

其实这一类事情古已有之。让我们来看一看,古代研究者是如何抗御稽康(224年-263年)之子嵇绍(252年-304年)制造的一场干扰。

稽康本是一位高水平的音乐家、文学家、思想家,因为才华横溢,得以成为魏宗室的快婿,荣任中散大夫。他一向神往于隐居修道的生活,很无意于当官,在曹爽集团当政的正始(240年-249年)中后期同山涛、阮籍等隐居之士结为林下之游(详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孙盛《魏氏春秋》),当时还有一个吕安(字仲悌,小名阿都),也同他们很熟,但因为水平较差而不在所谓“竹林七贤”之列。

后来发生了高平陵之变,司马懿用非常手段一举消灭了曹爽集团,阮籍和山涛先后跑到司马氏手下当官,阮咸、王戎、刘伶去向不明,原来意义的林下之游就风流云散了;这时继续紧跟稽康的只剩下一个向秀,吕安也还继续追随于后,于是形成了一个或可称为“竹林后三贤”的小组。他们三人经常一起在首都洛阳或稽康的山阳寓所锻铁灌园,继续过潇洒浪漫的隐逸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吕安的后院很快出了大乱子。

吕安的妻子徐氏甚美,吕安的哥哥吕巽(字长悌)诱奸了她,弟兄关系破裂;吕安欲“告巽,遣妻”(《世说新语·雅量》“嵇中散临刑东市”条注引《晋阳秋》),嵇康本来是先认识吕巽后来才与吕安多有交往的,作为吕氏弟兄的朋友,他出面进行过一些调解,未能解决问题,时任相国掾的吕巽竟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卑鄙地诬陷其弟,说吕安殴打母亲,大逆不道。此举致使吕安被捕,稍后吕巽又设法把他流放到边远地区去。嵇康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吕安,而根子则在吕巽,这家伙太无耻太恶劣了,就与之绝交以抒愤懑。出人意外的是,吕安在被流放去边郡之时,却写了一封长信把嵇康臭骂了一顿,而且慷慨激昂地大谈其政治,似乎他之被捕和流放乃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家里出了丑闻。这是一篇相当奇怪的文字:

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梁生适越,登岳长谣。夫以嘉遁之举,犹怀恋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别之后,离群独游……进无所由,退无所据,涉泽求蹊,披榛觅路,喙味沟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艰难,然非吾心之所惧也。……时不我与,垂翼远逝,锋距靡加,翅翻雁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濯秀清流,布叶华崖,飞藻云肆,俯偃潜龙之渚,仰荫栖凤之林,荣曜眩其前,艳色饵其后,良俦交其左,声名驰其右,翱翔伦党之间,弄姿帷房之里,从容顾盼,绰有余裕,俯仰吟啸,自以为得志矣,岂能与吾同大丈夫之忧乐者哉!去矣穉生,永离隔矣!

按一般的逻辑,吕安应说明自己并无“不孝”之行,据实告发乃兄的禽兽行径,争取从被告席上走出来;可是这位“放逸”的名士在这里用相当浮夸的言辞把自己形容成是一个志气极其高远的大英雄,责备嵇康不能与自己同其大丈夫之志,他以一个服刑者的身份说这一番话,客观上把自己弄成一个政治犯的样子,无异于玩火自焚,而且把嵇康也一道烧进去了。

吕安不肯与司马氏合作或坚决反对司马氏都是可能的,但并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他有什么巨大的计划和具体的行动;他信中的那一番大话说得毫无根据,惟一的效果是引起司马昭很大的疑虑,加速自己的死亡。信中严责嵇康,同样没有道理。吕安在信里一再暗示嵇康与曹魏宗室的关系,说气话激他出来为自己辩护——这就大有绑架老朋友的意思了,殊非交友之道。稍后阴谋家钟会正是抓住这封信,把这个曾经表示看不起自己的仇人嵇康形容成司马氏最危险的敌人,从而把嵇康和吕安一起送上了死路。

在这之前,当嵇康写出《与山巨源绝交书》时,钟会即建议杀嵇康,司马昭未听;到吕安事件发生后,是否牵连逮捕嵇康,司马昭颇为迟疑,征求部属意见,于是“钟会廷论康曰:‘今皇帝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荡王度。’”于是录康,囚狱”(《世说新语·雅量》“嵇中散临刑东市”条注引《文士传》)。钟会抓住吕安的信不放,硬说嵇康乃是一个有影响的与司马氏集团对立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危险人物构成对司马氏大业的重大障碍,因此决不可以放过。

嵇康下狱后,钟会又再次大进谗言,进一步把他形容成司马氏最危险的敌人,终于把嵇康送上了刑场。

吕安这封《与嵇康书》写得莫名其妙之至,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很多年以后,嵇康的儿子嵇绍已在晋朝当了官,便不承认先前吕安这封信给他父亲的信,硬说这信乃是赵至(字景真)写给嵇茂齐的,同乃父完全无关。“翱翔伦党之间,弄姿帷房之里,从容顾盼,绰有余裕,俯仰吟啸,自以为得志矣”,这些话孝子嵇绍看得实在不舒服。

家属特别是身有身份的家属来说话,总是显得很有分量,所以尽管早有干宝等学者指出嵇绍的说法完全不对,但《文选》选入此文(卷四十三)时,还是题作赵景真《与嵇茂齐书》。古写本《文选集注》卷八十五署赵景真《与嵇茂齐书》题下《文选抄》引干宝《晋纪》云:“(嵇)康有隐遁之志……(吕)安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巽病之,反告吏谤己。巽善钟会,有宠于太祖,遂徙安边郡。安还书与康……”又就该文署名问题发表意见道:“嵇康之死,实为吕安事相连,吕安不为此书言太壮,何为至死?当死之时,人即称为此书而死。嵇绍晚始成人,恶其父与吕安为党,故作此说以拒之。”

为《文选》作注的唐代大学者李善在他的注释里并引嵇绍、干宝《晋纪》二说,结果弄得“题云景真,而书曰安”,显得不伦不类。稍后继续为《文选》作注之李周翰指出:“《晋纪》国史,实有所凭;绍之家集,未足可据。”

这一桩公案经过当代学者的仔细研究(详见黄侃《文选平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247页;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35-443页),确认此信出于吕安之手,嵇康之子的曲说不足凭信;但也还有学者采信嵇绍的证词。嵇康嵇绍父子去今已经1700年,而关于那封信性质的纷争仍未能完全尘埃落定,家属对文学研究之干扰的严重性有如此者。这样看来,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抗干扰恐怕相当任重道远,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吧。

人推介西方先进思想。他在这个寓所还经历了慈母病逝和中年丧偶的人间巨痛,也在这里染上鸦片毒瘾,不能自拔,终身受害。

如今,故居遗址上一座严复塑像引人崇敬。天津人以严复为荣耀。然而,当我问出租车司机时,他不知道严复塑像,也不知道严复是何许人,直到我带他去古文化街,他才恍然大悟说:“去那个旅游点啊!”以军事交通学院内的严复纪念馆来说,也主要是对军事学院学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似乎不是随时向公众开放的场所。这不禁令人感慨,严复曾经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是民族文化的骄傲。然而,他没有能够走进,普通大众甚至都不知道他。一个民族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杰出人物,不能够高扬自己文化的旗帜,何谈民族自信?许多学者对严复做了大量研究,也出版了相当多的专门论著,但也还只是在相对小的范围内引起反响。严复文学传记应当为广大家众熟知,严复和民族文化做出自己的努力。这丝毫也不降低其历史的、学术的意义和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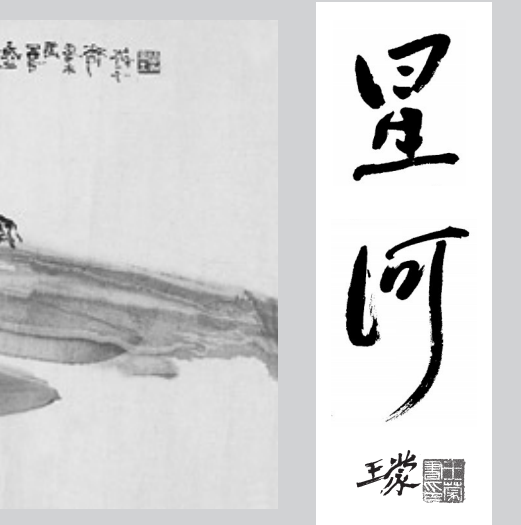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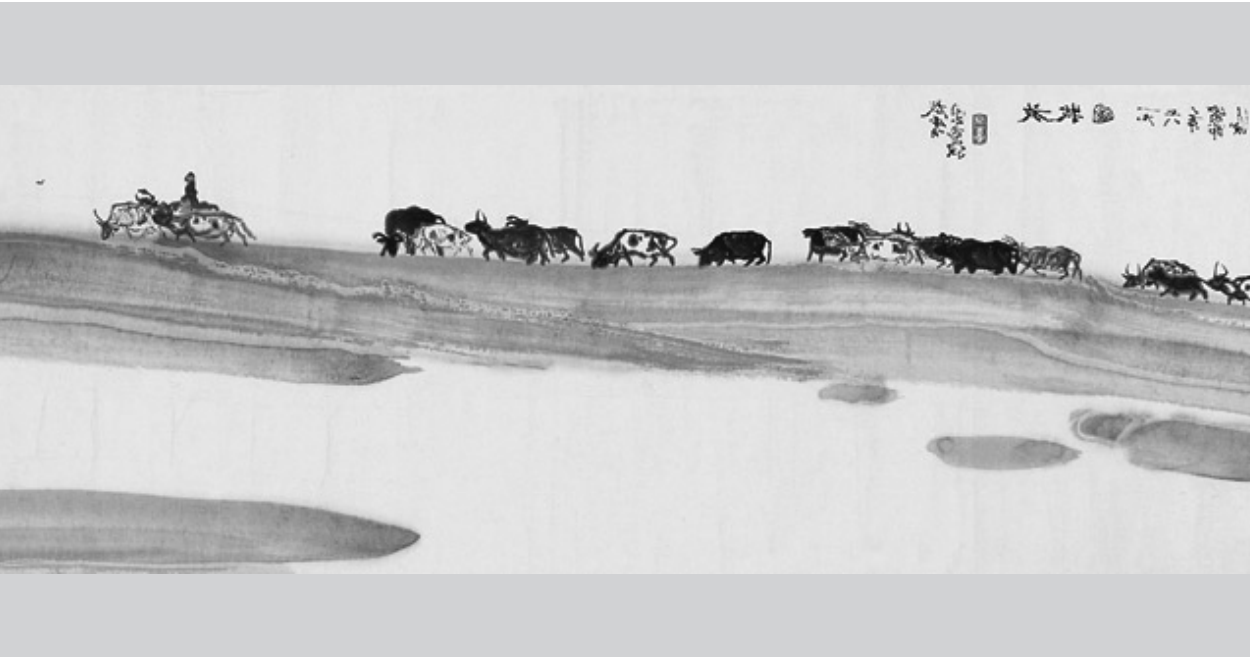
从闽江到海河

——感受文化巨人严复

杨肇林

站在海河广场上,但见河阔流平,融汇了上游的山水和京杭大运河,一起泻入渤海。果然是“九河入海”,气势不凡。这里是中华民族交往海外各民族的起点,是中西文化交融的汇合处,一度是“天朝国门”。然而,也是西方列强蜂拥而入的豁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海河沿岸有连绵的租界旧址,那些重新修复或仿建的西方建筑,风格多样,有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称,然而也留下民族屈辱的伤痕。严复在1889年到1890年居住在英租界的德源里一栋两层的小洋楼,不到两年,为逃避八国联军的炮火而仓皇离开。严复在海河之滨,“激扬文字”,“横空出世”,引进西方的哲学、人文、政治思想,唤醒了沉睡的国人,也以中国传统的智慧丰富了人类共有的思想宝库,他后期的一些思想,对于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不无启迪。人们不仅要看到严复为“中国西学第一人”,更需要从中西文化融合的大潮流来理解严复。

沿着严复的足迹,我追寻到福建马尾。这里是近代中国人追求富强的中国梦的起点。这个堪称中国第一所的少年海军学校,走出了严复。严复敢冲天门向人间,第一个把西方先进思想介绍给中国人,催发了晚清的变法维新,高擎起照亮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炬。我曾经多次到福建探访严复的足迹,虽有所获,但总觉得散漫,不得要领。



放牧(局部) 徐庶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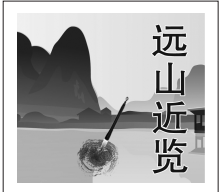
尹庚:几被遗忘的人

郑绩

期可惜未能见到,不知有些什么作者。抗战爆发后,尹庚任中共南方局地下党主编的《群众新闻》日报总编、副刊编辑。上海沦陷前夕,他率上海职业青年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做宣传工作,创作了一些话剧。之后,他从东南战区辗转回浙南游击区,又到浙西前线,都做文化宣传、统战工作,编过《杭州市报》,也曾在桂林与巴金一起做出版。1946年,应王思翔邀,与张禹一起赴台湾,在台中《和平日报》副总编、总经理及台中第二中学校长,在那里认识了杨逢、谢雪红等。“二·二八”之后转基隆创办《基隆市报》,随即得知已上抓捕名单,回到上海。1948年左右,尹庚在上海海天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光与热丛刊》。莫洛的散文集《生命树》在“丛刊”之内,后来尹庚乞讨于内蒙古时,还曾收到莫洛寄来的书充作精神食粮。

1950年,许史华与尹庚等开办私营出版社泥土社,尹庚任主编。他还与张禹一起参加了台湾自治同盟会。尹庚任泥土社主编是兼职,他当时已参军,是三野台湾干训团教员,后调华东军区司令部外语学校、中央军委外国语学校任教研究室副主任。1954年转业到内蒙古河套地区,任坝坎中学即奋斗中学老师。

1955年之后,他没有错过任何一场政治运动,头上帽子极多,从“胡风分子”、“右派分子”、“托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直至“蒋帮特务分子”。“反胡风”运动时,他被押回北京审查22个月,最终认定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放回河套任临江中学教师。然而1957年他还是戴上“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两顶帽子,被劳动教养3年。释放后在临江建筑队当泥水工。“文革”中他帽子愈多,曾经被捕的经



现代文学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左翼小老弟,他们充满热情,做了大量工作,也经历了惨痛的命运,但在文学史上却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尹庚就是其中的一个人物,他与不少文学事件相关,尤其是研究泥土社,他几乎是不可错过的人物。但是他身后名声不彰,若无特别钩沉,恐将永远沉没。

尹庚,1908年生于义乌福田十里牌村,原名楼宪,又名楼曦、楼允庚。1927年毕业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之后在报馆当记者、编辑。1931年留学日本,协助胡风成立左联东京支部,又参与组织文化同盟。1932年回国,加入中国左联,任闸北区支部组织委员。并在潘汉年、冯雪峰等人带领下,与胡风、聂绀弩等组成新兴文学研究会,同时在朱镜我主编的《文化斗争》任编辑、刻印等。1932年10月,去工人夜校的途中被捕,经龚鸿文保释出狱。当时天马书店的楼逸马、叶以群等相继入狱,尹庚遂接手任天马编辑。天马在他手上大约出了二十几本书,其中包括鲁迅的《门外杂论》。这套书在1946年左右继续由尹庚主编,在香港创作社重版,标明“按1935年天马书店重印”。1949、1962、1972、1982年创作社都曾再版这套书,只是没有尹庚主编和按天马重印字样了。

之后天马经理韩振业被暗杀,营业员被绑架,尹庚避入正行女子中学任教。1936年,经白曙介绍编辑《现实文学》,创刊号非常精彩丰富,可谓名家荟萃,鲁迅、巴金、茅盾、胡风、田间、张天翼、唐弢……《现实文学》的撰稿人几乎都是左联成员,倾向太明显,立遭查封,两期而止。此刊非常少见,第二